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一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八期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012b)

【人物追踪】	五大领袖今何在？	丁 东
【春秋史笔】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读书笔记】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	茅于軾
【一家之言】	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	刘 源·何家栋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追踪】

五大领袖今何在？

• 丁 东 •

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曾经并称“五大领袖”。其中，谭厚兰已经于1982年去世。筹备这次会议时，宋永毅先生指定我以五大领袖谈文革为题参加讨论。此前，我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三人有交往，这次，我又分别与他们三人进行了交谈。王大宾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我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所以本文主要介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和想法，并就与五大领袖相关的问题作一讨论。

一、五大领袖的由来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出现了天下大乱。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其他六位同事，于5月25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什么？》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6月1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因此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在文革

初期因为批评工作组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领导人，并且在1967年担任这四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他们五人就有了“五大领袖”的说法，（1）到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他们五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2）而这次召见，标志他们从此将退出历史前台。

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的近况

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1938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干部。她从1968年起受隔离审查，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受审查。1978年被逮捕，1983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保外就医，1986年假释。自1984年以后，她一直要求官方解决她的生活来源。按照离休干部标准解决她的生活待遇。经过她多年申诉，并且找到一些老关系的帮助，直到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开始给她发生活费，当时每月600元，现在提高到1000多元。后来又让她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医药费报销90%。2004年给她安排了一套小三居住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蒯大富出生于1945年，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68年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年，清查516，他被押回清华受审查。1973年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刑满释放。后和一位山东籍女士结婚，移居山东。90年代到深圳，和朋友合伙办公司。近年官方同意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深圳落户口。虽然他本人早符合在深圳居住五年以上、每年交税10万元以上的条件，但还没有同意让他在深圳落户。但经多年申请，山东方面两年前给他办了护照，允许他出国旅行。他也到泰国旅游了一次。前年，他曾经接受记者田炳信的采访，但嘱其不要发表。去年田炳信发表了他们对话的内容。官方为此找蒯大富谈话。大意是这些年我们对你不错，你为什么接受采访。蒯大富说，你看，对话里我说了：“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3）他目前经济收入不错，但政治上还是感到有隐形的压力。

韩爱晶出生于1946年，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设计系）。他在五大领袖中最后一个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选择了湖南株洲的一个企业。1970年清查516被押回学院受审查。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目前他在深圳一家朋友的公司担任管理人员。买了房子，收入水平不如蒯大富，但生活没有问题。政治上不如蒯大富引人注目，但也有隐形压力。一年多以前，官方传唤刘晓波、余杰，本来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给他们的心理投上阴影。

因为他们都是文革中的名人，所以不断有人要采访他们，请他们口述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

在撰写文革回忆录的问题上，聂元梓动手最早，态度最积极。她在1990年代就先后与两位作家学者合作，撰写个人回忆录。书稿在上世纪末完成，但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有的出版者原想拿这本书赚钱，和她订了合同，一看无利可图，就无限期拖延。有的出版者认为她写得不到位，想让她修改，她又没有能力深化。但此书的电子文本早已在文革研究界流传。直到2004年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推出。在此过程中，医生曾建议她动手术，并说，如果不手术，脊椎神经受压迫可能全身瘫痪。但她表示，回忆录出不来，绝不手术。此书出版后，读者对她的印象有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记忆偏重于洗刷个人的冤屈，对重大

历史细节的回忆和揭示较为薄弱，有些情节不够真实。

韩爱晶近几年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他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调查、搜集资料与思考。今年，他已经完成了一篇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态度。他对细节是很认真，记述也十分详细。目前他还写出了一些手稿，何时发表，如何发表，还没考虑好。他表示要做一个文革的研究者。我曾经和他说，你可以是历史的研究者，但首先是历史的当事人。建议你第一步先把自己亲历亲见的事情写出来。第二步再调查其他的知情人，当事人，互相比较核实。你的回忆录发表以后，自然会有许多知情人和研究者要和你讨论，一些弄不清和不准确的事在讨论中可以澄清。但他对写作看得很重，不想轻易出手。他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国内的新左派。对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极为反感，由此对现行政治保持距离。他的基本情结，还停留在1966到1968年。这可能是一些文革中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心理特征。

蒯大富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公司有二十多个员工，由他主持，业务比较忙。几乎每天都有商业上的应酬。他觉得，自己出身贫寒，希望惟一的女儿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过富裕的生活。但他从事的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钱越来越不好挣，所以，他目前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继续实现自己的挣钱计划。海内外关于文革的已知他也注意搜集和阅读，对于朋友们建议他写回忆录，他总说是等退出公司再说。他们生性喜欢热闹，不拒绝和各界名流接触。喜欢谈论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笑话、顺口溜，有时给人一种游戏人生的印象。

他们共同的希望：一是厘清史实，二是澄清责任。

厘清史实的意义，不只是关系到他们个人形象，也关系到历史记载的完整。他们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他们当时许多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相联系，和文革中的重大事件相联系。他们的回忆，是还原文革领导层真实状况的重要参考。韩爱晶整理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全过程的回忆就是一个证明。蒯大富向我回忆了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批斗结束后又由江青打电话让蒯大富放回王光美。这些情况，目前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

他们在文革中又担任过一个阶段的大学领导人。文革中大学里的斗争和冲突有一些记载，但日常运行状况是历史记载的薄弱环节。比如韩爱晶谈到他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期间，组织三结合班子研制成功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目前于史无载。

他们又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讲述的群众组织的形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和政权的关系，和周恩来、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革委的关系，都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通过与他们接触，我感觉国内传媒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真实的经历差距甚远。况且，国内公开媒体有关他们的信息十分有限，流传较广的《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等文章，和《文革闯将封神榜》等书籍，都是一些记者在八十年代撰写的，宣传意味很浓，谈不上客观真实。所以，他们厘清史实的愿望是合理的。

澄清责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判刑时，他们都拒绝接受审判的结果。

聂元梓去年11月6日对我说：文革问题再严重也是路线性质，不属于触犯刑律。如果按

刑律处理，那么A B团你们该枪毙多少次？政治斗争不应当刑事处理。她在1986年的申诉书里也说：“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4〕她还再三说明在文革初期一些具体问题上她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有分歧。

蒯大富、韩爱晶至今不回避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好感。

蒯大富说：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么？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5〕

韩爱晶在12月27日对我说：当时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给自己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未来社会献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思想非常明确、非常坚定，而且影响一生。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个过程，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好跟着毛主席干。他是虔诚地相信毛泽东的理论信念的。现在，他除了为自己没有信守毛泽东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动手打了彭德怀的耳光而自责外，自认为在北航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他首先以民主的方式复课闹革命，他主政时期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至今还在使用。他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没有任何多吃多占，甚至没有拿过一分钱公款，完全靠家里每月提供的30元钱生活。北航也没有分裂为两派。他认为，自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革命失败了，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小兵或者说是一个失败的将军。

三、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责任

一些朋友听说我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有接触，往往问我：他们对文革有没有反思和忏悔。他们对文革不是没有反思。聂元梓对我说：“形成文革不是一天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文革不可避免，除非五四时候彻底民主化，彻底反封建。不要怕讲文革。形成文革的因素每个人身上都有。发动者负主要责任，被发动者也有责任。彻底反思现代迷信，每个人都有责任，领导和群众都要反省。应当总结文革教训，不应当回避。”

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和丑化了的，对他们的刑罚与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相符的，司法正义要求罪罚对称，所以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而且，我发现，和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人，多对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些人大多同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甚至在认识他们以前已有不良印象，但接触之后都变为理解同情的态度。原因很清楚，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誉因为当政者的需要受到精心的保护，而他们这些毛泽东的追随者却承担了过度的责罚。他们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被抛弃，在清查516过程中都是审查对象，邓小平主政彻底否定文革以后，他们又被判刑。在台上活跃了两年，阶下囚却当了十几年。这无疑是命运的悲剧。从做人来讲，他们现在是平民百姓，为人基本上是平和的，的确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鬼怪，有的保持着一些当今稀缺的优点。比如，韩爱晶对某些人在管理国有资产时大肆洗钱，中饱私囊就十分气愤，他到深圳本来有可能参与其中发财，但他出于信仰不肯与之合流。

评判文革中群众领袖的历史责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有如巨大的绞肉机，人要想同时保持自身的平安和清白是极其困难的。以人权为尺度，所有人不外四种情况：一，整人者；二，挨整者；三，既没整人也没挨整者；四，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整人意味着不义，挨整意味着无辜。既没整人也没挨整的情况比较少见。既整过人也挨过整的情况十分普遍。

五大领袖都属于既整过人也挨过整者。但他们当时名气大，影响大。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害，虽非他们直接所为，但和他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比如，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矛头所向本来是陆平等三人，这三人又和北大社教中的恩怨有关。聂元梓等七位签名者中的六人在社教中挨过整，所以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拍得那么高，早已超出了聂元梓的想象。这张大公报公开广播后，导致许多学校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争，哪是聂元梓始料所及？

单正平在《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6〕讨论过文革中的几种犯罪类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旨意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二是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集体屠杀；三是在全国普遍施行的“造反”——冲击政府机关，抢夺武器，临时夺取政府权力等等；四是抄家或“打砸抢”，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此外，他把文革中造反派之间武斗，为此死了不少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视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和一种犯罪。单正平把这五种情况都归结为国家罪错，认为最终责任人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他的分析，比起把罪责单纯归结林彪、江青集团和造反派，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其实，文革初期包括中央和地方一些党政领导，甚至包括后来被整死的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都参与过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迫害。他们也是毛泽东共产党阶级斗争主张的实施者。

五大领袖在文革得势期间，在三、四、五项有不同程度的活动。他们够不够刑罚，要看他们的具体责任。当时对于五大领袖以推翻政权、颠覆政府来论罪，显然不符合事实。他们是毛泽东在其执政的特殊阶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当中央书记处的职能被中央文革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以后，五大领袖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成员，经常充当中央的特派员。他们实际上在直接或间接地执行着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他们在主观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聂、蒯、韩在文革中的造反行为，适用于单正平对“造反”的分析：“表面上看党政机构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毛泽东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红卫兵’在他的领导下造政府的反。当时，各级政府被毛泽东及其高层助手当作‘夺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的高潮时，毛泽东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因此，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表现。”〔7〕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采取了政治运动的特殊形式，不是利用各级党组织掌控运动，而是利用群众组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样，就出现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之争，甚至升级为武斗。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目标达到以后，重建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目标。此时的聂元梓、蒯大富，无力控制北大、清华校内的两派对立和武斗。毛泽东抛弃他们是必然的。但他们对武斗死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则要看是否具体参与：是否亲自动手，是不是亲自发令。蒯大富在工宣队包围清华时说过可以武力抵抗的话，有一定责任。但他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对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校的决策并不知情。当时定罪专门选择对他不利的证据，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证据。

下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是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1982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都有五条罪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干部、学生。

前三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上海市夺权，即“一月革命”，是毛泽东的决策。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被定为反党集团。朱德挨批，也可追溯到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会议记录已经披露出来，刘少奇主持，林彪、陈毅、周恩来都有发言。（8）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中央决策而已。

后两项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责任。她在1966年批判过常溪萍。起因也是常1964年参加北大社教与聂的恩怨。这是她的错误。但她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遭到残酷迫害以致含冤死去是1968年5月25日，其间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至于迫害北大师，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多方证明聂元梓并无直接责任。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彭真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彭真同志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彭真同志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9）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决定，（比如江青，原来高层主张判死刑，陈云不赞成，改成缓期执行。）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来决定，而法院不过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的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审判结束后，蒯大富对法官表示感谢，不是因为法官能够据实量刑，而是因为法官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否则，他可能要多关八年。蒯大富是很明白的。韩爱晶坦言自己是卷入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蒯大富在审判张春桥时出庭的证词，至今为韩爱晶否定。聂元梓则反问：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看见儿子就想起聂元梓。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就是报复。1966年，政治局开会讨论516通知，你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她还说：一批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现在生活困难，二七厂徐凯连退休金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怎么也得给一碗饭吃吧。河南有一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没犯死罪，总得给基本生活条件。

中共建政以后，政统保持至今。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整人的积极分子，大多都受到保护。像反右派运动，后来基本上改正了，但整人者从来无须承担责任，甚至不曾要求他们道歉，有官职的照样做官。只有文革例外。特别是造反派这一批文革特殊阶段的积极分子，受到政权的特殊对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挨整，周恩来通过清查五一六有意扩大了清查范围。文革结束后，从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到登记在册，他们又一次挨整。政统虽然没变，最高权威却调整了。核心人物从毛泽东变成了邓小平。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是领导者之一，所以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受到保护。文革前期，邓小平受批判，自然要否定这一阶段的运动积极分子。两案审判也好，清理三种人也好，其准绳就是确立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在清理三种人

过程中，文革初期参与过打人的一些高干子女，因为与邓小平的沉浮同步，则被视为可信任的子弟，受到保护。当时的审判虽然申明要实行法制，宣布只追究被告的刑事问题，不追究其他问题。其实，审判实际上还是政治行为。

近几年，关于是否存在“人民文革”的话题引起了讨论。当时一些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甚至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感到失控的行为是否可称“人民文革”，本文无意讨论，但我认为，就五大领袖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来看，虽然具体情况各异，但都是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他们最初都是毛泽东政治主张的真诚信奉者和追随者。他们曾经为个人权利受损抗争，后来为适应毛泽东不同阶段战略部署的需要而成为政治新星。他们的造反活动，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意图。蒯大富和韩爱晶，至今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对于他们这五大领袖而言，称为“人民文革”是不适宜的。

注释：

〔1〕余汝信，《1968：7.28召见与运动的终结》，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4/06/200406010934。

〔2〕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

〔3〕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kuai。

〔4〕《文革第一号造反派人物聂元梓：“我不是反革命”》
www.kanzhongguo.com/news/gb/articles。

〔5〕同3。

〔6〕单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引自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37—240页，博达出版社2004年

〔7〕同上

〔8〕《内幕：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www.peacehall.com/forum/lishi/706。

〔9〕引自《刘贯一致胡耀邦的信》，《聂元梓回忆录》代序第10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

□ 原载“共识网”

~~~~~

【春秋史笔】

混世魔王毛泽东

• 刘晓波 •

〔作者二〇〇六年在博讯网重发这篇文章时，曾有如下说明：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即现《开放杂志》）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四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 一、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东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 二、毛泽东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



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 三、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宣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码，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 四、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准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 五、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份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封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回圈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与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文明，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 六、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类似上面所列举的民族劣根性还很多，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

【读书笔记】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

• 茅于軾 •

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大家能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他跨不上汽车而不得不请人把他抬上去，他长期卧床而腿肚子又细又弱。现在大家从了解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得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无非是一个人，虽然他的智力过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他不能突破规律，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他根本不是神，对他的一切迷信将会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饿死人的最高记录，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无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容，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如果毛泽东不那么相信阶级斗争，而是以和为贵，搞团结，他死的时候绝不会那么孤独，虽然有三年灾荒的责任，他作为开国元勋，还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可见毛泽东是被自己的阶级斗争毁坏的。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多次教训江青要团结，他只看见江青到处斗人如何糟糕，但是江青只不过是他的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他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细节看，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为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

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199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的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虽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说“不出三五年必将腥风血雨”。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个局面。他已经疯狂了，被阶级斗争搞疯狂了。让江青接班是他仅有的最佳选择。他之所以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周会臣服江青。他本来的理想是让周恩来协助江青掌权。但是周恩来无法和江青合作。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共产党在建国时期涌现的无数英雄人物竟没有一个能够及得上一个泼妇。毛泽东之昏庸和他极高的智力相结合，把中国搞成一个不成为国家的“国家”。在毁坏国家上他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无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一。

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文革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越看越清楚了。毛泽东是了不起的，能够把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一个个斗倒，消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可以随便打，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毛整死的高干无一不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痛苦再死掉。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甚至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这都是学的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又是幼稚的，他绝没有想到最后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边，剩下一批狐群狗党。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大家吹嘘毛的高瞻远瞩，其实毛是鼠目寸光。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亲密战友都被整得众叛亲离。毛死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抓捕了四人帮，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把他们判了刑。但是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消除一切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

评判。

~~~~~

## 【一家之言】

### 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

• 刘 源 • 何家栋 •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

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就要深深吸取教训。必然的，非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

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 ◇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治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

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请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

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话，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

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是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一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一呼百应。

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一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

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

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一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

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

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

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

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

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

#### ◇ 貌合神离的合璧

1963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

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

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

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刘少奇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如果这句话还没说清性质，那么下面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显而易见，刘少奇是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5年在全国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统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一些，触及疼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揭深批透”。

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

许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

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

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

#### ◇ 亲密战友的分裂

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

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产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遍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

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

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

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 原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作者：王光美、刘源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